

纪念西安事变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梁星亮 王宝成

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研究会、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1996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纪念西安事变与弘扬爱国主义”。与会的海内外学者 90 余人,提交论文 60 篇,对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唐德刚、张梅玲指出,西安事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是中国由内部纷争向团结抗战的转折点,中国之所以能在 1937 年奋起抗战,西安事变实为契机。房成祥针对国内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悲剧”、“得非所值”的论点,指出:西安事变的最大作用是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全民族对日抗战的发动,这是中国一个极大的进步。蒋介石通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没有能消灭红军,统一中国,而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向蒋介石作出必要让步,赞助他统一中国。蒋介石答应抗日,也缓解了同各地方实力派及其他政治派别的矛盾。因而蒋介石在事变中得到了以前想得到而始终未能得到的东西。

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是事变各方发扬爱国民族精神的胜利。丁胜利、牛桂云、房成祥等指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一种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翁有为指出,张、杨的爱国思想是西安事变发动与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关于毛泽东、张闻天、潘汉年在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叶心瑜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是中共提出并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郭志民认为,在和平解决西安变事的总体框架下,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日、对苏、对蒋、对张四个具体方针,使总方针条理化、科学化 and 可操作化。王秦认为,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潘汉年肩负重任,历经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使命,为促进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蒋文祥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事变和解后,蒋介石部分地信守了自己在西安的“诺言”,终于停止了剿共内战,实现了一致抗日,是值得赞许的。李秀芳认为,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有三:(一)消释南京方面的三次讨伐浪潮,稳定南京方面的政局;(二)派端纳去西安探明真相,宁陕开始对话,为解决事变打开了通路;(三)宋到西安后,影响了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并同张、杨、周恩来等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熊宗仁、李仲明对以往史著中认为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在西安事变中之所以力主“讨伐”,是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何应钦主战的动机主要是以救蒋脱险,惩治张、杨和反对联共抗日为目的,亦是“以战逼和”并乘机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策略,而非阴谋篡权,取蒋而代之。

梁星亮、邢建榕对冯玉祥、端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的努力作了论述。对马占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史学界过去尚无专文论述。王宝成对马占山在西安50余天的言行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事变初发,他审时度势,鼎力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并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事变之中,他被委以重任,积极参与西安方面重大的军政部署;事变后,为和平解决善后问题奔走斡旋,充分表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爱国情怀和胆识。

关于西安事变引起的国际反应,郑德荣认为:苏、日、英、美、法、德、意虽均有反应,但以日、苏为甚。关于日本,我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妄图乘机挑起中国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并不尽然。日本最担忧的是南京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同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怕会遭到欧美国家的谴责,故日本以所谓“静观”的态度对待西安事变。关于苏联,他认为,事变中苏联既遭到日本的猜疑与非难,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猜疑。它对此特别恼火与焦虑。于是既斥责张、杨,又不满南京政府而提出抗议。张庆瑰论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具体处理事变的方法曾有原则上的不同。

吴天威等学者们认为,西安事变史的研究过去有很大进展,但有许多研究领域尚需开拓,许多薄弱领域仍须加强。会上,陈铁健对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作了评论,并就史学研究如何突破“禁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与会学者还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开放西安事变的档案资料,尽快建立一座现代型的西安事变纪念馆。

(作者单位:梁星亮,西北大学;王宝成,陕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